

从电影《望道》再见父亲



随着影片的展开,看到那些熟悉的情节,我仿佛跨越百年与父母见面了。

时而激动、时而紧张、时而焦虑,情绪一下子难以平静。两个小时左右的电影《望道》落下帷幕,我仍然沉浸在无限的思念和遐想中难以自拔。

片中的演员们仿佛穿越时空,把自己融进了一百多年前那个风雨飘摇、贫穷落后、民不聊生、苦难深重的时代。剧组人员查证、挖掘无数史料,使得演员浸淫在那个时代的氛围里吸取时代养分,由此形成人物的思想脉络、性格逻辑。他们以真实、鲜活、具有思想穿透力和情绪感

染力的艺术形象,打动观众进入观众内心,引发情感上的共鸣。

在创作前期,剧组主创人员曾先后三次与我们讨论。记得有一个细节想写父亲在翻译中苦思冥想,为了清醒头脑把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我觉得不妥,农村山里三四月份还比较冷,当时家里都是泥地,又没下水管道。现在改成外出打一套武当拳,符合实情,因为父亲小时不仅功课好、体育也很好,每天晚上和课余还要练武术,练了十多年。

影片中描写的父母爱情也是真实的。蔡慕晖1901年出生在浙江东阳蔡宅,是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

活动家,还被称为民国时期浙江东阳的第一女硕士。

他俩从1920年到1927年,从相识到相守,1930年成为伉俪。他俩自由恋爱,在东阳蔡宅的“乐顺堂”,举行了一场简单、文明而又浪漫的婚礼。一生感情笃厚。

编剧贺子壮说:电影《望道》不是陈望道个人的传记片,通过影片里一大群有志爱国青年激励当今广大的90后、00后,希望当今广大青年树立起为党和国家强盛的理想和坚定不移的信仰,青年强,则国家强。更希望影片给观众留下更多的启示和教育。

朱良玉(陈望道先生儿媳)

日出东方 长望大道

作为传记电影,《望道》并未拘泥于人物书写的面面俱到,而是抓大放小、将艺术创作与历史真实相融汇,力图展现出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

大凡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影片,如何通过影像将散落在报刊史料中的人物重新聚合起来,是创作人员无法回避的难题。这既考验编剧的功底,也关乎着导演的匠心独运。伴随着银幕的缓缓拉开,《望道》呈现出两条相互交织的叙事线索:一条是发生在杭州的一师风潮,另一条则是身处上海的陈独秀登门拜访著名翻译家费煌堂。陈独秀敲开弄堂的小门,石库门内部的阴暗逼仄扑面而来。身穿旗袍、烫着旧式卷发的中年女性端着面碗出场,见微知著,即使是如此微小的角色,影片也并未敷衍对待。主人公陈望道以一袭长衫出场,嘴唇微抿,眉毛时时紧锁,头发、鬓角打理得服服帖帖,这“一身的长衫,一脸的消瘦”也让观众下意识地信服:即使相隔百年,这的确那个渴望大

道的青年人。

《望道》贴近历史,却也并不局限于“纪录片”的一方天地。导演有意在影片中插入历史元素,一张张泛黄的旧报纸让观众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上重新审视电影中一幕幕重现的影像。艺术与真实相互交织,其中呈现的错落感使整部影片的节奏不徐不疾、从容不迫。

但他也深谙镜头艺术与历史真实之间的独特张力,在二陈(陈望道、陈独秀)与李汉俊等人在“新青年编辑部”招牌下合照的情节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仲甫西装挺括、左手插兜,初出茅庐的望老神情尚余青涩与拘谨,李汉俊则指尖拈烟,斜倚着砖墙,镜头固定在这一瞬间,彩色的光影慢慢化为黑白,仿佛记录着某一历史时刻的老照片。但短暂的停顿后,照片中的人物又纷纷复苏、影片重新步入轨道。陈望道、蔡慕晖车站送别的浪漫情怀、陈独秀在日历上画圈计时等情节也令人会心一

笑。此外,在呈现诸如“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一类的经典故事时,导演没有浓墨重彩、大费周章地渲染,仅仅通过陈母之口衬托,余韵无穷。

不同于文学作品对人物心理的极尽描摹,《望道》并未对陈望道内心的求索作更深入的探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影片放弃了对望道内心的刻画。反而,导演巧妙地借用对环境的展现来反映角色情绪的流变。在众多的场景中,导演似乎偏爱颇具上海风味的廊道:当陈望道翻译完《共产党宣言》时,冒着大雨兴冲冲地赶往陈独秀家中。镜头先是聚焦于撑伞在大雨中疾行的陈望道,翻译文稿被小心包裹在胸前的行囊中,即使衣角发梢都被飞溅的雨点打湿,陈望道的眼神中仍满是熠熠的辉光。随着镜头不断拉远,观众的视野也逐渐抬高,俯视着巷道中发生的一切:打在伞上溅起的水花、急切的敲门声,陈望道完稿《共产党宣言》的兴奋与喜悦溢于言表。

康启蕙(中文系20级本科生)

追光的人,自己也成为一道光

传记片的创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挖掘传主“秘不示人”的猎奇性素材,或者塑造一个与观众已有认知迥异的“新人”形象。相反,由于观众对于传主多少是熟悉的,传记片的创作方向要么是将观众脑海中只有笼统印象的人物,变得立体可感;要么将观众此前只有模糊概念的历史事件,通过人物的亲身经历,变得鲜活具体。

除了使观众对传主的认识更为深入,对传主的人生境遇有身临其境般的感同身受,传记片还必须通过传主的“事功”,对观众产生情感上的震撼和思想上的冲击,并使观众获得蕴藉而深沉的人生体悟。在此过程中,传记片要用大量细节填充传主的人生经历。这就意味着,传记片必须决定,究竟是“以事件折射人物性格”,还是“用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这两种处理方式看起来都完成了塑造人物的任务,但艺术效果迥然不同。

电影《望道》没有全景式地回望陈望道的一生,而是聚焦于1919年5月至1949年5月这三十一年里,他的革命和战斗生涯。影片将他置身于最为动荡的历史情境中,去书写人物的命运起伏和内心激荡,并突出他身上以一贯之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境界。

影片有意选择了中国最为“黑暗”的一段历史时期。在那个看不到“光”的年代里,有人执着探寻,有人沉沦堕落,也有人渐生退意。正是在这种杂芜的人生百态中,才能意识到陈望道坚持在黑夜中追光的可贵。

影片开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场景里,这里有大量青年学生,画面多是亮调,且有暖光。影片在上海的第一个场景,是陈独秀到著名翻译家费煌堂先生的家。这里是一个石库门建筑,暗调的画面,逼仄的空

间,令人倍感压抑。

这两个场景不仅承担了介绍人物和交代核心情节的作用,还暗含了时代性的隐喻。陈望道和陈独秀都是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有一腔改变民族命运,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向和热情。陈望道通过对身边的学生传授真诚、平等的现代意识,融入反抗权威,追求个人独立与解放的精神,为学生的人生带来“光”,为社会变革和国家进步带来希望。陈独秀则想引入更为先进的斗争理念和思想武器,作为革命的行动纲领,认为这才是中国需要的“光”。

这就可以理解,陈望道回到义乌老宅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影片不时用特写强调那盏黑夜中的油灯。油灯虽小,但灯芯明亮,并使房间洋溢着一股暖意。这是陈望道心中的理想之光,也是《共产党宣言》所带来的光明。我们需要用“光”来驱散寒意,用“光”来照亮前路。

影片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编织了一条完整的情节线索。当年负责印刷《共产党宣言》的工人杨阿龙,因这本书受到启发和鼓舞,走上革命之路。当杨阿龙倒在反动派的枪口之下,他珍藏的《共产党宣言》作为一颗革命火种得以流传,成了儿子杨逢林的珍贵精神财富。当杨逢林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并在离开重庆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陈望道,生命像是完成了一个奇妙的轮回。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共产党宣言》是艰难时世的一盏明灯。这时的陈望道,已经从一个追光的人,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那道光。

这是影片值得肯定的艺术成就。

龚金平(艺术教育中心教授、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好电影必做于细

《望道》从剧本开发起,历经两年多筹备,主创团队搜集海量的相关资料,深入现场挖掘真实人物性格和生活细节,用珍贵的一手资料丰富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大到建筑环境,小到服化道细节,乃至陈望道额头前的一缕白发,都经过严格考据、精心设计。无论是演员形象,还是场景环境,都尽全力还原。

在充分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剧组在场景及服化道方面严格考据,1:1还原了浙江第一师范教学楼和陈望道的家,通过精心的布置让观众看到当年的复旦大学教室和新闻馆。

在拍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这场关键戏份时,为了还

原陈望道真实的笔记,剧组手写了上万字的文件和草稿。片中仅出现短短几秒钟的《共产党宣言》日语本,也是剧组几经周折遍寻数地才找到并复刻还原的。剧组还特意找来当年同样型号的印刷机器,跟印刷师傅学习如何排版印刷,最终在影片中完整地展现出当年印刷《共产党宣言》时的一整套流程。

拍摄老蘸墨汁吃粽子这段故事时,一开始用食用色素调的墨,刘烨和导演商量换成真墨吃下去,真实效果马上出来了。在片中饰演陈望道母亲的奚美娟回忆起这场戏,表示“妈妈看着又好笑,又有点心疼他。”

本报记者 钟荷